



## 大国竞争中的合作——美国、苏联与冷战

梅尔文·P·莱弗勒<sup>1</sup>

编者按：冷战期间，美国在与苏联竞争的同时也意识到，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必须对竞争进行调节，并寻求与苏联合作。这一时期美苏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条约，以减缓军备竞赛，降低摩擦和对抗的可能性，并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本期推荐的文章回溯了冷战期间历任美国领导人的对苏合作决策，认为当下的中美竞争应当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从杜鲁门到里根，每一任美国领导人都意识到：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合作可以促进美国的繁荣与安全。竞争本身不是目的。苏联必须得到遏制，但美国人民的和平、繁荣和自由才是首要目标。因此，必须避免核冲突，防止核扩散，维持国际秩序，促进美国的财政、金融和经济健康发展。为此，美苏通过正式协定、非正式谅解等方式进行合作。美国还巧妙地实施遏制政策，避免在苏联认为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挑战对手。作为回报，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没有再次跨越美国的红线。

### 一、冷战开始

杜鲁门政府认识到了东欧对苏联的战略重要性，即使采纳了遏制主义，也并未挑战苏联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美国明确了西德、法国、英国对自身的

---

<sup>1</sup> 梅尔文·P·莱弗勒 (Melvyn P. Leffler) 是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本文英文原文登载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官方网站：<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operation-amidst-great-power-rivalry-united-states-soviet-union-and-cold-war>。此为中文摘译版。

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从而确立了马歇尔计划的框架。当斯大林明确表示不会容忍任何西方资本主义渗透到东欧时，美国聚焦于其在西欧的核心目标。美苏逐渐勉强承认了彼此的核心利益，并建立起正式和非正式的行为准则。双方都明白相互间正在展开一场零和战略竞争，但也都认识到直接对抗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这一点在朝鲜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美苏都仔细评估对方的核心利益和敏感性，以避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然，战略竞争也有其自身的逻辑。《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最充分地体现了美国的看法。文件的主要作者保罗·尼采认为，苏联渴望统治世界，美国必须认真应对极权主义对民主资本主义构成的前所未见的威胁。该文件开启了美国军费开支的根本性转变，促进了美国战略空中能力和战略核能力的快速提升。

## 二、冷战期间的合作轨迹

### 艾森豪威尔政府

艾森豪威尔对美国财政状况深感担忧。他认识到美国需要军事力量来支持有效外交，但也认为财政审慎和经济活力是国家繁荣的根基。斯大林逝世后，艾森豪威尔表达了通过美苏合作来促进和平的想法。他拒绝采取削弱苏联力量的战略，因为这样做代价太大，也太具有挑衅性，转而寻求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并探索合作的前景。然而，在他任内，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欧洲、中南半岛、台湾海峡和中东地区危机四伏。艾森豪威尔认识到竞争中潜藏的危险，并寻求与苏联合作。美国在这一时期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和《南极条约》。艾森豪威尔甚至在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上呼吁美苏两国政府分享各自军事设施的设计图，并允许航空摄影。他还支持美苏双边文化交流协议的谈判和实施。

### 肯尼迪政府与缓和的吸引力

随着苏联的威胁日益严重，肯尼迪上任之初决心迎接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挑战，挫败苏联加强东德政权合法性的行动，并应对苏联在技术上取得的优势。但古巴导弹危机使他改变了想法。

肯尼迪意识到，合作可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核试验造成了环境污染，引发民众抗议；军备竞赛耗资过大；第三世界的斗争可能诱使美苏陷入无关两国重大利益的冲突。面对这些问题，肯尼迪看到了缓和的吸引力。他与苏联谈判达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对赫鲁晓夫购买美国小麦的请求做出了积极回应，因为这也会使美国农民和美国经济受益。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一改往日对登月竞赛的热衷，主张两国应当合作避免在外太空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是第三次柏林危机，也随着柏林墙的建立而结束。美苏在维持德国分裂和对德控制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双方都担心统一的德国会重新集聚力量，倒向某一方，从而破坏既有的均势。

### 约翰逊时代：新的地缘政治动荡中的利益趋同

尽管如此，合作还是停滞了。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指责苏联支持越共的行动。苏联则拒绝谈判，并加快发展战略武器，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战略力量与美国基本持平。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专注于越南战争，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约翰逊的许多顾问意识到，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里，苏联和美国在阻止核扩散问题上利益趋同。面对共同的危险，美苏在1968年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到60年代末，双方都意识到他们正面临一个动荡不安的新时代。两个超级大国都受困于不安于现状、要求更多自主权的盟友。同时，亚洲、非洲和中东新独立的国家一面要求援助，一面决心追求自己的利益。

约翰逊致力于在国内建设“伟大社会”——一个包括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一系列其他项目在内的宏伟愿景。他认识到，美国不可能在承担国内议程高昂成本的同时去支撑一场军备竞赛和一场越南战争。约翰逊希望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合作追求共同目标，包括防止核扩散、禁止在太空使用核武器等。他认为在空间生物学和医学、卫星通信以及气象信息共享等领域开展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在此背景下，美苏达成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双边协议（1964年）和国际条约（1967年）。

### 尼克松政府时期利益驱动的合作

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认识到，不加节制的战略竞争和军备竞赛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面临一系列国内问题，而美国人民不会愿意承担军备竞赛的成本。尼克松认为相对于苏联，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持续削弱，由于公众舆论和立法限制，其相对军事力量还将继续下降。因此，当不太可能从竞争中获益，且当另一方同样希望达成协议时，合作变得顺理成章。1972 年 5 月，尼克松在莫斯科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和反弹道导弹的条约。

尼克松认为，两国之间摩擦的根源不是军备，而是地缘政治。他在 1969 年会见苏联大使时指出，美苏需要缓和中东、越南等地的局势。两国努力为竞争制定规则，并在 1972 年签署了关于双方合作关系“基本原则”的协议，旨在建立基于主权、平等、互不干涉、互利原则的双边关系。最重要的是，双方将尽最大努力避免军事对抗，防止核战争。为此，两国还签署了一项防止公海和公海上空发生意外事件的协定，以避免可能引发战争的意外冲突。

在追求缓和的同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并未忽视美苏关系的竞争性及其意识形态基础。比起裁军协定，他们更重视双边贸易协定，因为贸易的增长可以使美国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希望利用苏联经济的脆弱性，并促进美国农产品销售。在美国的竞争优势减弱时，缓和被认为是促进美国根本利益的手段。合作意味着努力避免战争，也意味着利用美国的优势对付苏联的弱点。

尼克松的政策也是对法国和西德诉求的回应。美国的盟国希望更自由地与东欧和苏联接触。为了保持同盟的凝聚力，美国需要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1975 年围绕赫尔辛基协议的谈判最能说明这一点。该协议是冷战期间美苏合作的巅峰。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谈判并不热心，但他们被事态发展的势头所推动，与加拿大等其他 34 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该议定书在华盛顿招致许多批评，涉及其中的人权条款、迎合苏联要求的领土让步等。批评者嘲笑其太过天真，并要求提防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随着苏联无视人权条款、部署新的武器系统、支持非洲和中美洲的左翼运动，以及向阿富汗派遣军队，批评者的指控变得可信，美苏缓和难以为继，与大国竞争的对手合作的观念受到了挑战。

## 里根与冷战的结束

里根于1980年赢得总统大选，他谴责缓和政策，承诺采取更大胆、更坚定和自信的外交政策。他希望增强美国实力，并谈判达成一系列新的协议，旨在恢复战略平衡，并逆转苏联在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其他地方取得的进展。

里根并未看到缓和对共产主义世界的颠覆性作用。贸易和债务日益把东德和西德、东欧和西欧联系在一起。合作不仅没有损害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反而通过颠覆共产主义政权、增加其对与西方经济金融关系的依赖，促进了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跌时，苏联无法再为东欧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于是骚乱愈演愈烈，共产主义政权摇摇欲坠。到80年代末，东欧各国政府纷纷垮台。在里根结束第二任期时，苏联日益依赖西德的贷款，这些贷款在1990年使苏联接受了德国统一以及加入北约，结束了欧洲的冷战。如果之前西欧和美国放弃了缓和，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里根认识到仅靠实力无法获胜，而且承认苏联也有合理的安全需求。他在给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的信中表示：他理解苏联曾在战争中遭受巨大损失，这定会影响苏联如今的思维；他和美国人民对苏联没有任何进攻性的意图；他承诺将为双方紧张关系的持久缓和而努力。面对国内民众，里根在1984年1月16日的一次演讲中强调了与苏联沟通对话的重要性。里根政府奉行了“可靠威慑、和平竞争和建设性合作”的政策。里根还在1985年美苏首脑会晤前通过副总统布什向戈尔巴乔夫传递信息，呼吁双方基于非核防御建立稳定威慑，努力“使核武器从地球上消失”。

里根明白，为了实现美国人民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必须竞争，但也必须合作；必须承认对手的合理战略需要；必须谈判，建立信任，并让对手挽回颜面。劝诱对手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合作与在有争议的问题上相互竞争同样重要。

### 三、结论

冷战为当今中美之间新的大国竞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如冷战期间美苏所做到的那样，中美必须意识到比竞争更重要的是避免直接对抗和核战争；必须在互动中发现彼此不可逾越的红线，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调节意识形态差异，并建立非正式的竞争规则，否则就可能陷入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境地。中美还必须认识到，绝不能忽视共同的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双方必须合作。

当下的共同目标远比冷战时期的更具说服力，因为中美两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两国的繁荣更加相互依存。此外，两国共同面临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来自气候变化、流行病、网络攻击、人工智能的威胁可以说比两国对彼此的威胁严重得多。因此，不能忘记以下经验教训：必须对竞争加以限制；必须对意识形态的对抗加以调节；合作必须成为国家安全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外，巧妙地合作可以为在竞争中取胜奠定基础。毕竟，合作为当时受困于国内社会、政治和金融冲突，在外还被战事所消耗的美国在 1965 年至 1975 年这段关键时期争取了时间，使其得以恢复、调整，并在冷战的较量中获胜。

（王润潭、陈丹梅摘译，归泳涛校）